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人文论丛

庞光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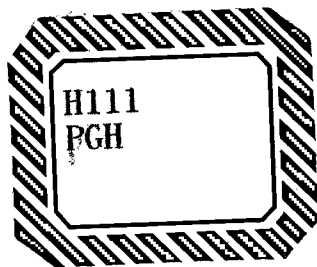
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

LUN HANYU SHANGGUYIN WU FUFUYIN SHENGMU

中国文史出版社

论汉语上古音无 复辅音声母

庞光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庞光华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7辑/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38-6

I. 论… II. 庞… III. 汉语—上古音—研究 IV. 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624 号

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20.25

字 数:563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40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迸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古有复声母说概述	(1)
第二节 对古有复辅音声母说的怀疑和批评概述	(5)
第三节 本书的目的和方法	(12)
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17)
第五节 本书的重要原则和理论阐释	(21)
第六节 关于用对音材料来研究上古音	(33)
第七节 关于用方言材料来研究上古音	(50)
第二章 从方法上论上古汉语无复辅音声母	(134)
第一节 从汉字形体变迁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134)
第二节 从六书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147)
第三节 从异字同形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157)
第四节 从反切的起源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182)
第五节 从自反原理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22)
第六节 从经典异读异文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40)
第七节 从材料的时代性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54)
第八节 从连音变读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61)
第九节 从训读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270)
第三章 从音理上辨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	(390)
第一节 论上古音中来母的音值及其谐声问题	(390)

第二节	论明母、晓母相谐的问题	(409)
第三节	论晓母、心母相谐的问题	(427)
第四节	论复声母 ml 的构拟	(436)
第五节	论复声母 sn 的构拟	(438)
第六节	论心母、喻四及舌头音相谐的问题	(447)
第七节	论来母、心母相谐的问题	(455)
第八节	论晓母、疑母相谐的问题	(463)
第九节	论透母、晓母相通的问题	(471)
第十节	论复声母 pl 的构拟	(478)
第十一节	论复声母 sm 的构拟	(487)
第十二节	论复声母 mn 的构拟	(491)
第十三节	论喻四与见系字谐声的问题	(495)
第四章	本书的总结	(592)
参考及引用文献		(600)
后记:叹学问之难		(63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古有复声母说概述

本书的开头首先要说明在本文中讨论的上古音声母的时代是具体限定在《诗经》时代至东汉以前^[1]。远古汉语乃至原始汉语的音韵问题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东汉末年以后的音韵问题也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构拟上古音声母的主要材料是形声字。但是利用汉字的‘谐声原则’去分析汉字读音的声母的时候往往会遇到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汉字的谐声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李方桂《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2]说:“研究上古音的声母一定要根据中国谐声字的系统来看,中国的谐声字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些现象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解释。”本文计划实证性地讨论汉字的形声结构中的若干重要的现象^[3],指出上古音声母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辨析一般音韵学家们的论著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并对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上的某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论述。

从高本汉以来,研究上古音声母的学者有相当多的人主张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4]。这些学者列举出了一系列的材料用于构拟复辅音声母。他们认为只有用构拟复辅音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解释汉字中的一些复杂的谐声现象。我们现在将主张古有复辅音声母的学者们的意见大致综述如下:

高本汉主要利用谐声字材料构拟了十九种复辅音声母,如 gl、kl、sl、xl、bl、pl、xm、sn 等等十九种。本书将会对其主要依据的材料予以辨析,论证那些材料不能支持复辅音声母的构拟。

林语堂较早地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5]一文,从联绵字、异文、谐声字的角度论证古有复辅音声母。林语堂此文有一个明显的出发点就是他利用了西方语言学的方法。然而汉语的性质并不是西方语言学就完全适用的。由于林语堂的文章影响很大,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有时会提到他的文章。我们将对他文章中的材料予以较为详细的辩驳。

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6]主要根据谐声字、联绵字、声训和对音材料来论证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陈独秀最后称:“笃守成说者,或目复辅音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其他学者类似的说法很多,提倡古有复辅音的主要论文大致收入了赵秉璇、竺家宁编的《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7]。《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书的末尾附录有研究复辅音的论著目录,收罗较为详备,我们这里不再一一称述^[8]。

罗常培等《普通语音学纲要》虽然称:“现代汉语的方言里,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上面这一类的复辅音。”^[9]但是罗常培对于高本汉、林语堂、陈独秀等人列举出的被认为是复辅音的表现的材料基本上是认可的,该书122—123页倾向于承认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说法。类似的不十分确定的意见也见于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10]282页《上古声母总论》一节,其文称:“上古有复辅音。其详不得而知,可是能用kl、ngl、t' l、sl、pl(ml)当代表音。汉朝以后全失去。”陆志韦也是面对一些谐声材料不知该如何解释,只好乞灵于复辅音之说^[11]。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第八章《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称:“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研究,上古汉语确实存在着复辅音声母,这至少有以下十二种证据。”^[12]杨剑桥说的十二种证据是谐声字、声训、读若、反切、重文、异读、音注、异文、方言、联绵词、古文字、亲属语言这十二种。他总结说:“由此可见,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实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唐兰曾经用‘声母的转读’来解释以上一些现象,但是如果‘声母的转读’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则上古汉语还能有‘声母’存在吗?显然‘声母转读说’是不能令人首肯的,这种驳论是不能

成立的”。^[13]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杨剑桥排比的十二种证据没有一种可以必然证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存在,我们将在本书中把他的一些主要证据作考证性的辩驳,指出那些证据为什么与复辅音无关。

美国学者罗杰瑞在《汉语概说》中甚至说:“这样一推理,高本汉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即中古音虽只有单辅音声母,而上古音则有复辅音声母。现在谁也不怀疑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而如何确切构拟,却仍有争议”^[14]。郑张尚芳先生在《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二)》^[15]一文中说:“虽然还有少数人怀疑,但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也已成了共识,即使持否定态度而影响很大的王力氏,在《同源字典》中也说‘黑’的古音可能是 *mxək*,故与‘墨 *mək* 同源’(253 页)。问题是要弄清复声母有哪些成分、结构规则及演变条例,高 *xm*、王 *mx*、李 *hm*、张 *mh*,到底应取哪一形式为是,也应有定着。”^[16]郑张尚芳《上古音系》^[17]76 页《复声母问题》根据汉藏语系的研究认为上古汉语一定会有复声母,他说:“既然同为汉藏语系的藏缅、侗台、苗瑶各语族都是复声母丰富的语言,惟独汉语例外没有复声母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汉语就成了与其他兄弟语言都不一样的怪胎了。观察时代较早的藏文、缅文、傣文、泰文,书面拼式中保留的复声母今读常常单声母化,说明这些语言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复声母简化的过程。因此认为汉语上古阶段有复声母,以后才单声母化,该是合理的推测;汉语应是整个汉藏语言复声母简化过程中发展较快、完成较早的一个模式。”然而郑张先生的这段论述包含了两个问题:如果古汉语本来有复声母,后来较早地简化为单声母,那么具体早到什么时代呢?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发生复辅音声母单辅音化呢?上古汉语与古藏语、古缅语之间有关系词,这是事实。但是这些关系词到底是同源词还是借词,很多时候非常不容易确定。这些关系词的时代层次也必须认真研究。而且上古汉语也有复杂的方言,古汉语与古藏缅语之间的借词往往是在古方言中发生,在古方言中的借词中常常会有一些特殊的音变。我们在利用所谓的汉藏语系来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时候,对所用的材料一定要经过严格鉴别。

台湾学者竺家宁有一本颇有分量的专书《古汉语复声母研究》^[18],

专门系统研究古汉语的复辅音问题,所用的材料主要是谐声字。竺家宁也是力主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

上面引述的罗杰瑞的话虽然表明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事实上并非象罗杰瑞所宣称的一样“谁也不怀疑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本书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对被学者们利用为证明复辅音的材料进行较大规模的辨析和考证,我们的研究将表明被用来证明复辅音的材料其实是不可靠的,这些材料根本不能反映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的存在。高本汉以来的主张有复辅音的音韵学者们对汉字的谐声结构作了过分简单的处理,未能理解汉字的形声结构中所蕴含的异常丰富复杂的情况,以及其它方面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只能用复声母来解释的现象,经过仔细的辨析之后,我们认为其实也可以用单辅音声母来解释。

我曾试图对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的意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我为此仔细阅读了关于复声母的著作。然而,我失望地发现学者们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予以详细的阐释。他们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各种根据可以大致分类归纳如下:

1. 在古汉语自身的材料中,他们认为有许多的谐声字、声训、读若、反切、重文、异读、古代音注、异文、方言、联绵词等等材料可以反映古汉语曾经有过复声母。

2. 学者们还惯于从所谓的汉藏语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既然汉语与藏缅语系诸语言是亲属语言,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也就是汉语与藏缅语在原始时代是同出一源,而无论现代藏语,还是公元7世纪以来的古藏文都有复声母,在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缅甸语、泰语等语言中也有复声母,那么作为同系语言的汉语上古音也应该有过复声母。学者们在构拟古汉语的复声母的时候往往利用民族语言的材料。主要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语言类型学,一个是他们认定的同源词。

3. 他们认为现代汉语方言中没有发现复声母现象,那是因为上古汉语经过了数千年的演变。学者不能以今律古,根据今天的方言中没有复声母就说上古汉语就没有复声母。

4. 他们认为自己是音韵学上的审音派,最精于音理。在他们眼中,清代小学家们讲古音通转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常常批评清儒说的‘一声之转’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只有采用复声母的观点,才能避免‘无所不通,无所不转’,才合于音理。

5. 他们还常常利用语言类型学的观点为复声母辩护,认为在印欧语中有复声母是很普遍的。古汉语也是人类的一种语言,应该合于语言的通则,在上古或远古时期存在过复声母。

6. 由于我国古代典籍浩繁,古文献中常常保留了不少的古代外语的音译词。所以,他们还常常利用古汉语与古代外族语言之间的借词的对音关系来构拟复声母。对音材料是他们经常利用的一件武器。

以上的六条是我对主张古有复声母的学者的各种根据所作的概括。以上各种根据的性质和重要性互有不同,最重要的是汉语自身所有的大量的谐声字材料。他们认为这些谐声字的读音与其声符的读音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不能用声音通转来解释,而应该用构拟复声母来解释。因为声母之间的通转要有一定的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就不能认为可以通转。然而,声母通转的条件是什么呢?是怎样确定呢?是靠人为的假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从研究材料本身得出呢?本书将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我们的答案将立足于对古汉语各种材料自身的客观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将表明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会背离人们的假设和想象,不是人为的理论所能范围得了的。

第二节 对古有复辅音声母说的 怀疑和批评概述

日本学者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19]对复辅音的态度相当慎重。他说:“汉藏语系的各语言间的比较研究,是只有在先完成了各语言自身的词族的研究之后才能着手的课题。而且,必须和与汉语关系较深

的泰语系各语言首先进行比较研究。但是,根据泰语系各语言所能确认的复声母,目前只限于 pl、ml、kl、tl 之类,即(复辅音的)第二个要素仅有‘l’。由此看来,在上古汉语中,可以认为确实存在过的复声母还仅限于这样的程度。这种做法才比较稳妥。”^[20]李方桂认为上古音有复声母,但对复辅音的态度比较慎重,他在《上古音研究》中把讨论复辅音的部分不放在《上古声母》一节,而是放在《上古的介音》一节里来讨论。他在该书 24 页说:“上古时期的复声母问题十分的复杂,其中有许多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这里我们亦不多去讨论。”^[21]董同龢《汉语音韵学》^[22]和《上古音韵表稿》^[23]虽然认为有些谐声材料可能反映了古有复辅音声母,但是他所构拟的上古音声母系统中並沒有任何复辅音声母,这表明董同龢对复辅音声母也抱有慎重的态度。

有些音韵学者滥用复辅音,甚至把在上古音中同是喉牙音声母的谐声字也构拟为复辅音,忽视了古人说的旁纽为双声^[24]以及转音的道理,我们在本书中对这类明显是牵强附会的复辅音构拟没有必要予以辨析^[25]。

反对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我们把反对派的根据分条大致列举于下:

(一)从语言的系统性的角度反对古有复辅音。代表学者是王力^[26]。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卷上第一章明确表示了不相信高本汉等人构拟的复辅音声母。王力先生论述曰:“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谐声系统看,似乎有复辅音,但是,现代汉语为什么没有复辅音的痕迹?人们常常举‘不律为笔’为例,但是‘不律为笔’只是一种合音,正如‘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不可为叵’一样,我们不能以此为证明‘笔’的上古音就是[pliet]。一般拟测上古的复辅音,都是靠谐声偏旁作为证据的。高本汉拟测的复音声母,有下列十九种。……其实依照高本汉的原则去发现上古复辅音声母,远远不止十九种。高本汉所承认的谐声偏旁,应该拟测为复辅音,而高氏撇开不讲的,有彗声的‘慧’,執声的‘势’,薛声的‘孽’,旨声的

‘诣’，支声的‘岐歧伎技茭’，支声的‘歧’，氏声的‘祗祗瘠’，岁声的‘顛翻𪔐’，岁声的‘𪔐’，岁声的‘𪔐’，等等。至于《说文》所说的谐音字，为高氏所不承认（或者是故意抹杀）的，那就更多。如谷声有‘俗’，公声有‘松’，区声有‘枢’，丙声有‘更’，号声有‘饗’，川声有‘训’，𪔐声有‘朔’，庚声有‘唐’，彦声有‘产’，多声有‘宜’等，不胜枚举。上古的声母系统，能这样杂乱无章吗？所以我不能接受高本汉上古复辅音的拟测。”王力先生虽然没有从正面反击高本汉等学者列举出的可以证明古有复辅音的材料，但深刻意识到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必须联系到上古音的音系。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复辅音，那么这些复辅音声母在上古音的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甚至上古音系该怎样建立呢？众多的复辅音声母和单辅音声母在上古音系中是怎样的关系呢？王力先生的观察显然是有说服力的^[27]。我们必须将上古音声母的构拟放在整个上古音系统中来综合考虑，而不能仅凭一些彼此孤立的材料来构拟复辅音。本书在重新分析学者们排比的复辅音材料的时候，时刻不忘语言的系统性。我们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假字系联法。正是因为强调了系统性的方法，所以我们才能对学者们煞费苦心找出的证明古有复辅音的材料作出新的分析和结论。

（二）用异读现象来解释被用于论证复辅音声母的谐声字和又音、异文等材料，从而反对复辅音的假设。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是唐兰。唐兰在《中国文字学·文字的发生·七·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这一章里对cl型复辅音声母进行了批驳，他还说：“要照我们的解释，则任何声母都有转读来母的可能，但並不是每个必须转读。”^[28]他在书中提出了谐声字中声母区别较大，彼此不容易通转的现象是异读现象，也就是一字多音。唐兰先生的这种见解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字有不同的读音以及一个字代表不同的词，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语言中都是非常正常的，极其普遍。其书41页总结说：“中国语言何以有这么多的声母转读呢？我不想多作假设。但是，我就听到过有人把‘顺’念作‘忿’，这种异读的偶然流布，在广大的区域，绵长的历史内，当然可能造成这种混乱的局势的。中国语言的元音部分，在古代大概比较固

定,而辅音部分却非凡含糊或疏忽,所以容易流动。例如:韵尾的辅音可以脱落(像入声);也可以转变。声母辅音也还有脱落,如‘影、喻’等母,那末,当然也可以转变。我想一个语言学家,如其肯虚心,不单抄袭西方人的看法,他总会觉察出中国语言的特点就在这辅音比较容易流动这一层。”唐兰先生的观点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古有复辅音声母。他用声母比较容易流动来解释声母会发生多种较大的变化,从而产生各种异读。唐兰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还嫌笼统,不能有力地说明谐声字的复杂现象^[29]。

(三)刘又辛先生在《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30]一文里从三个方面批评了高本汉、林语堂提出来的论证古有复辅音的证据。第一是‘关于古今俗语的问题’,即语言的历史发展方面论述古无复辅音。如‘角’字,刘又辛说:“‘角’的上古声母可能属来母,到隋唐时期,才渐读为见母^[31];再到后来,来母的读法就完全消失,只保存在字书和方言中了。对于这个‘角’字,如果用复辅音说加以解释,就很不容易通过。……。”第二是‘关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证据’。刘又辛认为用汉藏同源词对音的方法来构拟上古音声母还没有可靠的成果。他说:“咱们研究上古汉语,不能不依靠文字材料。汉语具有四千多年的文字记载,藏语则到七世纪时才有文字,其他语言的文字更晚。如果我们根据亲属语言的近代语言材料,用以作为构拟几千年前上古汉语语音的依据,那是要十分慎重的。”刘又辛还引述了岑麒祥《普通语言学》126页的论述:“汉藏语系的诸语言,因为它们分隔了很久,并且分布的地区很广,其间的共同点也是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词源关系上找不到足够的、确实可靠的证据。把它们加以比较就常显得软弱无力,难以令人信服。”刘又辛称岑麒祥的“这个意见值得我们深思。”孙玉文教授近来完成了一篇论文《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32]批评滥用汉藏对音来构拟上古音声母。第三是‘关于谐声声符的两谐问题’。刘又辛认为如果用高本汉、林语堂等人的方法根据谐声字来构拟复辅音声母,那么会出现三辅音声母、四辅音声母的情况,他认为:“这样一来,不是脱离汉语的实际情况更远了么?”^[33]